

隐语掩饰的官场贪腐

所谓隐语,说白了就是行话。从官场、科场,到市井各行,乃至江湖,都有流行于圈子内的行话,大多不为外人所知晓。

据说明朝末年,有一个地方上的学台,在当时的正式官街叫做提学副使或提学御史,是专门负责一省秀才的录取乃至考试的官员。此人生性贪婪,一上任就派人在外面招摇,声称要成为秀才,必须付白银三百两,显然就是公开叫卖科名。

当时有一个想买秀才的童生,入场考试时就被安排坐在“来字三号”,言外之意即“来三百两白银”。考试结束后,童生急忙如数付上银子,发榜时,得以荣中秀才。从此以后,凡是考中

者,都用隐语称为“来三”;若是不中,则称“不来三”。

还有北京板爷所说的“一吨”、“一方”,其实属于数字隐语,也是渊源有自。搜集各种史料记载,这种数字隐语,至迟在宋代就已初露端倪。

宋朝人以“千”为“撇”,以“万”为“方”,不乏其例。到了元末明初,这种采用数字隐语的方法,仍然盛行于官场。如明初出任苏州知府的张亨,就将得钱一万,称为“一方”,而将得钱一千,改称“一撇”。

至明朝正德年间,太监刘瑾擅权,贿赂公行。凡是官员向刘瑾行贿,说馈赠“一千”,即为“一千”,说“一方”,即指“一万”。此

类以“万”为“方”的例子,从明代颇为博学的大学者焦竑的口中,同样可以得到部分的印证。

古代中国官场好比庙堂,庙堂语言原本以雅致为主。不过,当官场贪腐成风,且贪官又不愿轻易让外人知晓自己的秽行时,隐语随之在庙堂流行开来。这可以视之为庙堂语言的江湖化。

明末崇祯年间,崇祯帝惩治贪脏甚严,于是官场行贿就不得不借助于隐语。如当时浙江仙居县知县过周谋,与掌管官吏考核选拔的吏部官员熊文举是同乡,曾派两位精干的仆人入京,谋求升迁。他在给熊文举的禀帖中有下面一段话:“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兴必有名世之教也。”这显

然是隐语,意思是说我已将五百两银子送到你父亲的宅中。这则隐语的典故为《孟子》,书中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不过是将“五百”数字隐去而已。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清朝末年的官场。如吴趼人所著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一位官员为了求人办事,送上一千两银子的票子,再附上一信,信中云:“附呈千金,作为打点之费。尊处再当措谢。今午到关奉谒,乞少候。云泥两隐。”

上面所谓的“云泥两隐”,原意是说两者的地位相差很远。此处以云指收信之人,泥指写信人自己。两隐,指把收信人和写信人的姓名都隐去不写出来。这是因为信的内容有关碍,恐怕一泄露出去,引起麻烦,所以就隐去这隐名的方法。

据《北京日报》

现在的清明节 其实是三个节日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清明最早只是一种节气的名称,由节气变成纪念祖先的节日据记载与寒食节有关。

寒食节是中国古代较早的节日,传说是在春秋时期为纪念晋国的忠义之臣介子推而设立的。但是,从实际历史来看,禁火、冷食实际主要反映了中国改火习俗的遗迹。

寒食节期间的习俗,主要有禁火、冷食和后来成为清明节主要内容的祭扫坟墓。中国人对祭祀祖先十分重视。到了秦汉时代,祭扫坟墓的风气更盛。到唐代,不论士人还是平民,都将寒食节扫墓视为返本追宗的仪式,由于清明距寒食节很近,人们还常将扫墓延至清明。

诗人们的作品,也往往与寒食、清明并提,如白居易:“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韦应物:“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

宋元时期,清明节逐渐取代寒食节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扫墓祭祖等仪式多在清明举行,就连寒食节原有的风俗活动如冷食、蹴鞠、荡秋千等,也都被清明节收纳了。

清明节还吸收了另外一个节日——上巳节的内容。上巳节古时在三月初三举行,主要风俗是踏青、祓禊(fú xǐ)(临河洗浴,以祈福消灾),反映了人们经过一个沉闷的冬天后急需精神调整的心理需要。

大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在清明扫墓的同时,也伴之以踏青游乐的活动。在哀悼祖先之余,顺道骋足于青青原野,也算节哀自动转换心情的一种调剂方式吧。因此,清明节也被人们称为踏青节。

融合了两个古老节日精华的清明节,终于在宋元时期形成一个以祭祖扫墓为中心,将寒食风俗与上巳节等活动相融合的传统节日。

据《文史博览》

陕西是财神赵公明的故乡

秦岭下的关中是财神的故乡。西周姜子牙在秦岭最高海拔的太白山拔仙台封了一大堆神,其中就有财神,而且五路总财神就是终南山下周至的赵公明,他也被称为中路财神。赵公明率领手下四位财神:“招宝天尊”萧升为东路财神;“纳珍天尊”曹宝为西路财神;“招财使者”陈九公为南路财神;“利市仙官”姚少司为北路财神,以专司迎祥纳福、商贾买卖而声名远播。

据乾隆十四年编修的《周至县志》记载:“财神赵公明,赵大村人,村中有赵公明庙。”唐时成书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赵公明得道于终南山,被尊为道家大神,属威猛将吏……被授予正一玄坛元帅……驱雷役电于宇宙,呼风唤雨于乾坤”。

周至的财神庙有两座。一是赵大村的赵公明主庙,被称为祖庙。二是楼观台田峪河东岸,修建不久的一座规模空前,占地约800亩的西安周至赵公明财神文化景区,因其大

被称为财神大庙。

说到陕西出的财神,终南山下还出了个活财神刘海,也称刘海蟾。刘海诞生于陕西户县曲抱村,曲抱村玉蟾台有唐朝所建刘海庙,道教大重阳万寿宫内有刘海蟾诗古碑一通——《十方重阳万寿宫记》。据载,刘海的真身为一位高道,被创派于终南山下户县重阳宫的道教全真道尊奉为全真道北五祖之一。

陕西有大年初二迎财神、敬财神的风俗。凤翔木版年画《恭喜发财》画面上,天空云雾中有招财童子、利市仙官,地面上有驮着金银的两匹马,还写着一行字:“马驮千倍利,尽进四方财。”财神文化应当起于民间。陕西省艺术馆藏的清代皮影《进宝童子》一对,是财神身边侍者,还有《财神垛子》,底下四蝙蝠,中间财神上边一蝙蝠和一吊金钱,寓意福在眼前、五福临门。足可见财神崇拜在陕西民间的盛行。

据《各界导报》

隆宗门匾额上留有一箭鏃

故官隆宗门的匾额上有个被射出的箭鏃,一直没被拔出来。

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皇帝一行前往木兰围场行猎。此时京城空虚,北京的天理教头目林清看到了机会,带领天理教徒对紫禁城进行攻击。

天理教是白莲教的分支,白莲教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组织。由于教义通俗,很容易被群众接受,元、明时期曾经多次组织起义,到了清朝则有一部分教徒将“反清复明”作为他们的毕生追求。

10月8日,天理教徒集结了200余人正式发动了对紫禁城的攻击。兵分两路,东路攻打东华门,西路攻打西华门。在几名太监的接应下西华门顺利被攻占,当门外的清军气喘吁吁追过来时,总管太监拦住他们,说内廷里住的是皇后、嫔妃,除了皇帝、皇子和太监能进,其余人踏进一步就是死罪。然后号召大批太监手持木棍前去捉贼。进攻东华门的天理教徒军因为一些意外,在关闭大门之前只冲进了5人,带路的太监看到只进来这么几个人,怕泄露身份,临阵倒戈喊来其他太监将这五人乱棍打死。

而西华门冲进来的60多人闷头闯进内务府一顿抢砸,等跑到距离太和殿一墙之隔的隆宗



门时,大门已经关闭了。他们又是砸又是骂就是打不开门。起义军找来几根大木头想把大门撞开,多次撞击大门纹丝未动,反倒把起义军累得够呛。他们知道隆宗门是进入内廷的关键,一旦打开内廷就任其出入了,所以一定要打开这道门。起义军见撞不开门,于是决定翻墙入内开门。

在官里的王公大臣也匆忙赶来,其中智亲王(后来的道光皇帝)和总管太监用鸟枪打死了爬上墙的两名起义军。这时援军终于赶到,起义军四散逃跑,最后在皇宫中躲藏了两天一夜才全部被消灭。而隆宗门上的箭鏃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嘉庆皇帝要求不要拔,留在那里示警。就这样,匾额和门柱上的两个箭鏃一直保留了200多年。

据《文史天地》

“吃”在古代并不是指吃饭

古代文字中的“吃”,并没有“进食”的意思,而是指人说话结巴即口吃。汉高祖刘邦手下有个著名的大臣叫周昌,《汉书》本传中有“昌为人吃”的记载,即指周昌是个结巴,绝非周昌被人吃掉的意思。

古代讲到吃东西,常用的是“食”字,如:食菽、食肉、食菜等,但又有“食酒、食水”等词,可见还包括“饮”的含义。稍后,分得细一些,则以“噉、啜、啖、哺”表示吃,用“啜、呷、吮”表示饮。《后汉书》载:“南方有噉人国”,那倒真是吃人的,而且“首生子,辄杀而噉之”,父母吃掉自己的头生儿子,实在太残忍了,不过可能是无稽的传说。

有趣的是,古今用字已有变化,所表达的意思有些却一脉相通。《隋书》上提到有人讽刺被封为宰相的高颎、杨素“唯堪啖饭”,意即“只会吃干饭”。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至今仍然沿用吗?《史记·魏世家》又有一句“欲啖汁者众”,说的是有人想

分得一点小小的富贵,直译现代语即“想捞点儿油水喝的人多着哩”。此说至今在某些场合也常有人用。

啜和吮,现在分别表示吃喝或喝解的,如《九思》有“吮玉液兮止渴,啜芝华兮疗肌”之句。还有嚼和呷,古人也用来表吃喝,如苏东坡家中有一年大麦丰收,即煮麦饭为餐,他的女儿们因此把吃饭称为“嚼虱子”。

“嚼”字还有个古今相通的词儿。今人称说废话为“嚼蛆”,古人也有此说,元人《西厢记》里有“怕不口里嚼蛆”之句,远溯至《魏书》,有句云:“卿何处放蛆来”,“放蛆”仍是胡说八道的意思,与“嚼蛆”义同。至于近古时习用的“喫”字,现在已是“吃”的异体字。此字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里未收,可见是东汉以后才出现的新字,到唐代,诗文中才常见,如杜甫诗:“梅熟许同朱老喫,松高拟对阮生论。” 据《光明日报》

“延安五老”称谓由来

“延安五老”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群体概念,指的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五位年高德劭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这个概念是何时形成、由谁提出的,各类文章莫衷一是。

1942年7月,朱德曾写了一首题为《游南泥湾》的诗,其中提到“五老”。于是,许多报纸杂志、网络文章在介绍“延安五老”时表示,党内外借此诗作,将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尊为“延安五老”。该说法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是目前有关“延安五老”概念形成过程的“主流观点”之一。

目前关于“延安五老”概念的形成,有两种“主流观点”,除了“朱德诗作形成说”,便是“毛泽东祝词形成说”。

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在延安补办了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亲临会场,并致祝寿词,他说:“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有研究者据此认为,“五老”的称谓是毛泽东提出的,并由此流传至今。

但据董必武回忆,苏区时期已有“五老”的说法,远远早于1940年。毛泽东列举的五人虽与“延安五老”相一致,但并未明确提出“延安五老”一词,所以不能作为“延安五老”已经形成的直接证据。

“延安五老”的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前身应是苏区时代的“五老”。董必武在回忆长征前的情况时说:“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

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这里指的是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和董必武——与“延安五老”相比,差别在于有何叔衡而无吴玉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何叔衡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后壮烈牺牲,其余“四老”则跟随队伍到达陕北。

“五老”概念的产生与五位老革命家的集体经历有关。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等人受党指派,赴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因年龄较大、经验丰富而被编在特别班学习。革命老人的聚集也使特别班被人戏称为“老人班”。长征途中,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人又一起被编在休养连中行动。

据《百年潮》